

中国民族史论著汇编

(一九九三年度)

黄国政 金家滋

赵秀英 张 莉

陆红妹 编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前 言

近年来，我国民族史的研究发展迅速，发表的论文，每年数以千计。这些论文分载于各类刊物中。由于目前全国发行的刊物数量很大，发行的渠道又各不相同（有的公开发行，有的自办发行，有的是内部刊物），就一地、一单位而言，若要见到所有有关刊物，是相当困难的；一个单位不可能全部订阅，也不可能期期不缺。这无疑给研究工作带来莫大的困难。即便是能见到所有刊物，面对如此大的量，一期期去翻阅，一篇篇去查找，耗时费力，亦常使研究者望而却步。

我所图书资料室每年都订阅大量专业刊物。在编辑此《汇编》过程中，我们除翻阅了本所所藏刊物外，还查阅了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当年度社会科学的有关刊物，并参考了其它单位收藏的刊物。

编此《汇编》的主要难点在于确定选文范围。这实际上要求回答“什么是民族史？”“民族史都包括哪些范畴？”等问题。这本是一个较大的科研课题，学术界至今尚未获统一认识。当然，核心问题比较清楚，其边沿问题，特别是与相邻学科的交叉问题实难把握。诸如，民族史与民族学、民族古代文学、民族古文字、民族古籍、民族地区考古等文章的区分与归类；民族史与地区史（如新疆史、云南史、台湾史、东北史等）、边疆史、朝代史（如辽金史、元史、清史等）的划分与界定等，都是难于断然确言的。为了确保本《汇编》的内在质量，我们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并广泛征求了有关专家和学者的意见，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本《汇编》的编选原则。

本《汇编》分卷主要以民族，一般以民族发源地为标准。如蒙古族、满族虽曾统一全国，仍按其民族分别归入北方卷和东北卷；再如西辽，按地域应入西北卷，但我们仍按其民族（契丹）归入东北卷。

类此，讨论云南蒙古族和西蒙古的文章皆归北方卷。羌族问题比较复杂，古羌的活动重心虽在西北，然其活动大范围仍包括西南地区，鉴于今羌活动中心在西南地区的情况，故将讨论羌族的文章全归入西南卷，以便集中查找。有关东夷等文章附入东北卷后。

鉴于研究北方民族文章量很大的情况，考虑到读者查找方便，本《汇编》将整个北方分订为东北、西北、北方三卷。这里的“北方”是指生息于蒙古高原一带的民族，如匈奴、柔然、蒙古族等，而综合研究三北民族的文章则收入综合卷。

为扩大读者视野，本《汇编》还酌情收了港台刊物的研究文章。由于共知的原因，这些文章在观点上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一并印出，仅供研究工作参考，特作说明。

资料是研究的基础，不详尽占有资料，研究工作无法进行。为了科研工作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辑的《中国民族史论著汇编》（1992年度），经过一年的努力，又与读者见面了。

本《汇编》采用原文静电复印汇集装订形式，按年度分卷汇编，本年度分为七卷：综合卷、北方卷、东北卷、西北卷、西南卷、中·东南卷、西藏卷。各卷再依文章多寡分册装订。

在我们编选的过程中，曾得到于宝麟、刘凤翥、任一飞、杨绍猷、祝启源、黄庭辉等同志的帮助，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业务水平和经济条件的限制，本《汇编》一定存在很多不尽人意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经便在下年度的编辑过程中改正。

《中国民族史论著汇编》编委会

凡 例

一、本《汇编》是为研究与教学人员提供的基本资料，收录范围包括对民族源流的探讨和历代民族政策、民族关系、民族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上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文章。

二、“民族”区别于“地域”。诸如对“新疆”、“内蒙”、“宁夏”、“青海”、“广西”、“台湾”、“东北”、“西北”等主要从地区角度的研究文章一般不收。但对其中内容重点谈论民族的则酌情收录。

三、对在全国建立王朝的民族政权（如元、清），一般问题作朝代史处理，本《汇编》只收其中有关民族的文章。

四、关于民族古代文学与古文字的文章，如主要从文学角度分析或单纯的文字解读一般不收，如通过文学作品反映民族史实和民族历史人物，利用民族古文字研究民族史的文章，则在收录之列。

五、涉及民族古籍（例如《蒙鞑备录》、《契丹国志》、《高丽史》、《南诏野史》、《辽史》、《金史》、《元史》、《清史稿》、《清实录》等等），包括民族文字古籍（如《西南彝志》、《满文老档》、《福乐智慧》、《格萨尔王传》等等），如从语言文字或文学角度的研究文章一般，如从历史或史料的角度进行研究和考据的文章则在收录之列。

六、一般考证地名沿革的文章不收，如对民族史关系极为密切的则收。

七、关于民族地区考古文章，如单纯从考古角度的发掘报告和研究文章一般不收，如利用考古资料研究民族历史问题的文章则在收录之列。

八、鉴于文章量过大，受经济条件限制，本《汇编》决定重点收录研究性文章。对于一般性的书刊介绍（尤其是广告式的介绍）、会议报导（尤其是新闻式的报导），以及宣传普及性的介绍文章一般不收。但对学术性强的书评，以及介绍国内外的研究概况、研究综述等酌情收录。

九、港台文章因是竖排，为装订方便，皆在各册之后。

目 录 (二)

论金代女真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张泰相等 (1)
1413年永宁寺碑与金代女真文石刻	和希格 (7)
明扈伦四部之一的叶赫部早期居城之所在	张云樵 (13)
绥芬河下游女真文化遗存	姚凤等 (17)
《龙飞御天歌》记东女真族源研究	董万岭 (23)
从“哈刺”到“背兒”	王可宾 (30)
简评纥石烈胡刺	陈国良 (32)
隋王朝对边疆辽海的经略	孟古托力 (36)
元代辽阳行省境内的契丹、高丽、 色目与蒙古	丛佩远 (45)
元代辽阳行省的农业	丛佩远 (53)
多尔滚和明清之际的社会历史动向	张中政 (64)
清前期东北旗学术论	张杰 (69)
清前期东北地区的满文学校	张杰 (73)
皇太极与红衣炮	张敬媛 (81)
皇太极喜得传国玺	徐扬 (85)
努尔哈赤起兵前史迹新探	高庆仁 (87)
景圣之治与承天太后	苗泼 (96)
辽阳访古：东京陵考察记	赵东升 (109)
清代满文篆书之管见	滕绍箴 (113)
叶赫部界限考	庄福林 (117)
叶赫古城考略	杨立新 (121)
八旗制度概述	陈佳华 (127)
牛录八旗创制之管见	宋国强等 (133)

清前期的“旗下开户”问题	崔 勇 (138)
试论东北八旗兵丁在生产中的地位	刁书仁 (142)
论嘉道以前的东北旗地	刁书仁 (147)
民国初年“抚鄂安边”政策浅析	刘金明 (152)
近年呼伦贝尔发现的历代官印	白劲松 (158)
哈尔滨城史纪元的初步研究	王禹浪 (163)
试论齐齐哈尔建城后的文化发展趋向	滕绍箴 (169)
真番郡考评述	李健才 (175)
鸿胪井的考察与研究	瀛云萍 (180)
关东文化论	李治亭 (185)
东北民族研究诸问题综论	张博泉 (195)
东北亚土著民族族称考	付朗云 (202)
东北亚史研究的新视角	李澍田等 (209)
隆化县少数民族历史与现状	谷井林等 (214)
索伦部三民族关系及文化复合浅析	刘金明 (218)
满——通古斯语各族“穆昆”研究	杨茂盛 (222)
试论东北亚地区的驯鹿文化	任国英 (235)
北方民族的民俗文化与北方岩画	鄂苏日台 (240)
牛河梁“女神庙”族属考	傅朗云 (245)
《黑龙江少数民族简史》序	方 衍 (252)
黑龙江领土的陷落与黑龙江将军	
衙门移治的关系	乌卫斯·卫戎 (254)
试论洋务运动时期的满汉联合	马艾民 (258)
满蒙关系新发展的里程碑——实胜寺	王佩环 (265)
满学：正在兴起的国际性学科	阎宗年 (272)
满学专家爱新觉罗·启琮教授	慕 曾 (285)
论满族伦理道德观的形成与发展	张玉兴 (290)

宽城满族人民的历史贡献	唐学凯 (300)
从一份“家训”看清后期满族的族长制	谢肇华 (306)
从吉林他塔拉氏看清代后期汉族宗教文化 对满族的影响	何溥澄 (310)
满族萨满教是典型的民族宗教	刘厚生 (318)
海东东青及其文化现象	于济源 (323)
九台市罗古屯赵姓满族历史调查	赵东升等 (331)
满族他塔拉氏家谱中的汉文化因素	何溥澄 (336)
“文革”先后的北京满族人	赵书 (342)
伊犁满族简介	苏祥和 (347)
满族学者唐向荣先生及其对辛亥滦州 起义的研究	陈述 (351)
探索与创新——读孙文良先生 《满族崛起与明清灭亡》	郑瑞侠 (359)
对达斡尔族称及族源问题的看法	巴达荣嘎 (361)
达斡尔族早期物质文化的语言透视	丁石庆 (366)
历史上达斡尔族与外界的经济交往	阿尔泰 (372)
巴尔达齐遭清廷惩说辨议——兼谈 达斡尔族有关历史传说的虚幻与史影	古清尧 (376)
“阿穆尔”名称的由来	乌云达赉 (384)
达斡尔族的著名爱国者——凌升	索日沙庆 (386)
民国时期达斡尔族教育述评	何丽 (388)
黑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一批鄂温克族 妇女头饰	郭思洁等 (391)
鄂伦春族的变迁	吴景芳 (394)
鄂伦春族地域“乌力楞”的特点	都永浩 (397)
鄂伦春佐领图记考述	赵复兴 (403)

论赫哲先民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付 艳 (407)
赫哲人的萨满教研究	张嘉宾 (410)
清初锡伯族编旗与居地考	杨茂盛 (420)
清代伊犁锡伯营综述	吴元丰等 (430)
延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考略	温海滨 (439)
中国朝鲜族的历史传统	马启成 (446)
中国朝鲜族移民史研究	黄有福 (451)
中国朝鲜族迁入史述论	金元石 (457)
朝鲜族历史研究概述	金泰国 (466)
东北亚地区朝鲜族迁移、分布及其特点	东哲九 (477)
丹东地区朝鲜族历史及现状调查	文钟哲 (481)
从朝鲜族传说看努尔哈赤祖先的发祥地	崔褰秀 (487)
史前东夷头骨人工变形拔齿含球习俗	逢振镐 (494)
东夷史前制陶业的发展	逢振镐 (500)
周代东夷嬴姓族的西迁和嬴姓国的业迹	杨东晨 (506)
东夷传中的古高句丽资料辨析	张昌熙 (513)
《古林竹书记年》之赤、玄、风、阳、 于、黄诸夷考略	李德山 (517)
关于萨满教的研究	地里木拉提·奥迈尔 (522)
东山嘴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与我国古代 北方民族的萨满教信仰	容观 寔 (530)
《尼山萨满》与萨满教	赵志忠等 (533)
一部满族文学故事的背景—— 《尼山萨满传》	(台湾)李学智著、黄明译 (538)
1992年辽金元史研究综述	王秀丽 (543)
长白文献与长白文化的初探	李澍田等 (551)

论金代女真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张泰湘 吕和咏 康波

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正是靠文化的进步。各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必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构成一个庞大的文化交流网。杂居共处的各民族文化相互吸收、融合,使其各自发生变化,整合为新的文化。人类文化正是在这种创造、交流、传播、融合中进步的。女真文化之迅速崛起,固然有多种原因,但女真人大量吸收、融合了中原汉族等兄弟民族的文化,从而促进了自己的飞跃发展,不能不是重要的原因。女真族作为一个优秀民族,以开放的态度,吸收了汉族和许多民族的文化成果,使自己跳跃式前进,迅速强大起来。

随着女真人生活范围的不断扩大,女真人的眼界也不断扩展,其文化建设经历了从不自觉到半自觉和自觉的过程。空间和精神之间其实存在着某些关系。一个社会的规模、面积以及人口密度决定其精神状态的某些特点,新大陆的发现就改变了欧洲人的思想。^①当女真人统帅着部下和各族人民挺进中原,在北方建立起星罗棋布的城镇的同时,必然要吮吸着充沛的外来文化养分。他们的眼界扩大了,他们取得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飞跃。他们在深山树海中世代培养的“勇悍、喜战斗、耐饥渴苦辛”^②的性格特点,“率皆骑兵……分合出入,应变若神,人人皆自为战”^③的团结奋战精神,氏族人员平等的“君臣宴乐……无复尊卑”、“不会奢侈”的观念……一旦融入先进的文化,女真文化的青春时期就到来了。“一种文化的每个青春时期事实上就是一种新的城市类型和市民精神的青春时期”^④。喜欢用马作陪葬物、装饰物的女真人正象一匹烈性野马,带着青春的活力冲入中原逐鹿,女真族从不自觉到自觉地吸收了中原先进汉文化的充沛养分,其创造的金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女真和汉族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有以下几点:

1. 战争。马克思主义认为,“征服这件事看起来好象是同这种历史观(指唯物史观)完全矛盾的。到目前为止,暴力、战争、掠夺、抢劫等等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换形式。”^⑤

2. 贸易。女真和汉族的文化交流史几乎可以说是一部贸易史。经济往来、产品交换,也交换了科学技术、军工武器、风俗习惯等等。恩格斯说:“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⑥

3. 迁徙。女真曾将大量的中原汉人、契丹人等迁往东北,“新迁之户”和当地女真人共同劳动,使那里的农业、手工业等都有了很大进步。在辽、吉、黑等省的金代遗存中,发现了大量的生产工具和历史文物,足以证明这一点。

4. 民族融合。女真同化了许多部落、部族,如五国部于金时加入女真,胡里改部中的一部分也加入女真^⑦。金代融入女真的还有黄头室韦、达卢古、兀惹、蒲里毛朵部等。民族融合,带来了多元文化。通婚,也是民族融合的一种形式,宗干把温热(兀惹)人千户李靖

之妹纳为侧室，就是因为其汉族式的教养，“衣制皆如汉儿”^⑧，“其国用汉文化”^⑨。入金的渤海女子和媼热女子果然生育了许多有教养的人物。如媼热女子所生的充，曾任金朝宰相，无疑促进了崇尚汉文化的风气。

5. 外交往来。仅举金、宋 100 年中的往来。从 1117 年 12 月北宋遣登州防御使马政出使金朝^⑩，到 1217 年金伐宋的 100 年中，宋出使金 500 多次，有名可查的 484 人；金出使宋 295 次，有名可查的 291 人。宋使金平均每年 4 次多；金使宋每年约 3 次。正常往来，使者每次大约 52 人。双方都有接伴使等，接伴使多至 345 人，有 240 匹马供使用；南北往来，大约有 400 官兵护送^⑪。使者往来，都有大量的贡、赐物品，其中不少是文物、典籍，如章演出使金，曾献上《资治通鉴》；王信使金，带去了米芾书法；洪皓使金，在冷山传播了汉文化，回来又写了《松漠纪闻》。榷场贸易也是通过外交确定的。总之，外交往来也是重要的文化往来。此外，还有图书、翻译、传教等的往来。

通过上述文化交流的形式，中原汉文化逐步渗入女真族社会。可见，在女真族文化历史发展过程中，给女真族以重大影响的首先是汉族。从出土的金代农业生产工具，如 1975 年吉林市郊出土的金代窖藏农具来看，与中原的形制样式基本相同，与出土的北宋的工具相比毫无逊色。它们出现于东北，说明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已广泛地传到东北并被使用。考古文物和资料表明，辽末金初，女真人的农业得到空前广泛的发展，农业村落和军事行政中心已很稠密，遍布东北，且深入到滨海及黑龙江流域的林区 and 山区。谷麦传入女真人中，许亢宗见到的女真已以面食为主了^⑫，不再是“自过威州（今开原）混同江以北，不种谷黍，所种止稗子。”^⑬或“自过宾、辰州、东京（今辽阳）以北，绝少麦。”^⑭

金代的手工业主要是在征服辽、宋和进入中原北部地区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它继承了宋、辽等的手工业发展水平。女真曾向辽、宋索要一些匠人，也曾将一些中原“工技之民”迁徙内地，因此金的作坊里的生产者多是汉族技工。金各官府手工业的劳动组织和统治办法，基本上沿辽、宋旧制。金陶瓷业较发达，主要是有辽、宋等陶瓷业基础，受北宋许多名窑影响，制作技术和形式不亚于北宋，是金最发达的手工业之一。金上京矿冶业的迅速发展，是与迁来的汉族等工匠分不开的。金入主中原后也获得了火药、火器和制造这类兵器的工匠，因此金也能制造各种火药，世宗末太原府曲县郑村中的李姓猎户，用火药于狩猎。^⑮中原先进的纺织技术也很快传至女真各地，金纺织业很快发展起来后，各地纺织品除供金境内使用，也销往南宋。南宋的“蕃罗”、“北绫”、“北绢”即来自北方的金境，“商旅多以丝绢易茶”^⑯。金代也有造船业，“悟室（希尹）得南人，始造船。”^⑰

宋、金榷场贸易规模大，历时长。由于战争，榷场或开或停，但人民的私人贸易都从未停过。南宋向金输出的有茶、象牙、犀角、乳香、檀香、生姜、陈皮、丝织品、木棉、钱、牛、米、玳瑁等；金向宋输出的有北珠、貂革、人参、松子、北绫、北绢、蕃罗、红花、甘草等。^⑱茶大量进入金，禁也禁不了，后来金自己提倡种茶。牛贩在郑庄私渡，“每岁青秋三纲，至七八万头。”^⑲河南南部与山东南部，与南宋接近，农业多荒废，但商业繁荣，刘迎《淮安行》诗谓：“迄今井邑犹荒凉，居民生资唯榷场，马军步军自来往，南客北客相经商。”金末关闭榷场，金蒙受巨大损失。

女真徙入中原后即卷入了货币经济的旋涡。海陵王于贞元二年发行交钞，正隆二年铸造了金第一批钱币，进入了货币经济的发展阶段。章宗时由银錠改铸为铸币，“承安宝货”是中国历史上银由流通进入货币的开始，是中国币制的重大进步，对后来影响很大。章宗即位，

将纸币通货改为永久流通，也是中国币制一大改革。上京及周围多次发现带有“行人”字样的银锭，如“行人唐公原”等名字，证明金有了银行的雏型。陕西临潼发现了带有“行人唐公原”字样的金代银锭，证明金时东北和中原的经济交流已很密切。

钱币的大量流通反映了商业和交换的发达。滨海以及邻近的东北出土的中古代钱币，绝大多数都属于女真时期。^②绥化县中兴古城和奥里米古城附近金墓中出土的中原瓷器和属于我国南方生产的丝绸，说明这里和中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往来，金通过贸易把江南产品输入中原北部及东北各地。有时南商甚至深入到黄龙府一带从事贸易。^③

在文字方面，女真族首先学会使用契丹字和汉字，以后又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但并未废除汉字、契丹字。朝廷的女真文字，一律译成汉、契丹两种文字。两三种文字、语言并用，是民族融合前常有的现象。随着汉化即封建化的深入，女真人尤其是女真贵族子弟多学习汉文经史及诗词，纷纷拜汉儒为师，如海陵王拜张用直为师，“与近臣燕语，辄引古昔君。”这说明契丹和女真的文字、语言在海陵王时期已趋于沉寂。世宗回到故地上京时感慨说：“吾来数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为汝等歌之。”^④由此可知，此时在东北的女真人会唱女真歌曲、习女真语的人已很少。世宗孙子宣宗、章宗就学，每日先学汉字，后学女真字，也是把汉语放在首位。章宗成绩好，不过会用女真语说简单的谢恩话，就受到世宗喜欢，“且为之感动”。由三种语言、文字减到两种甚至一种，标志着民族同化的逐渐完成和女真封建化进程趋于一致。

金的教育远承唐而近袭辽、宋，又有一定发展。海陵王天德二年在金首建国子监，后来又设州府学，开创了女真学校教育的历史。以中原的教育思想和经史作为核心（如翻译《贞观政要》以教女真人），在教育思想上力求把女真国俗与中原经籍揉合在一起，进一步把中原教育发展成为多民族所共享的教育。^⑤以后，“章宗性好儒术，即位数年后，兴建太学，儒风盛行。学士院选五六人充院官，谈经论道，吟哦自适。群臣中有诗文稍工者，必籍姓名、擢居要地，庶几文物彬彬矣。”^⑥可见汉文在教育中举足轻重，无怪乎女真语言文字逐渐消沉。

金之科举承辽、宋，有词赋、经义、策试、律科之制。海陵王在金首创殿试制度，亲自观试、阅卷，甚至亲自命题。世宗时创进士科，章宗要求试者“通治《论语》、《孟子》，涵养器度”，以知“教化之原”，加强科举的道德教育。他下诏令35岁以下女真亲军，必须学读《孝经》、《论语》。科举取士之目在章宗时亦完备，明昌初又设制举宏词科。总之，金代教育、科举随整个上层建筑的发展而日隆，“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⑦金代的刑律，起初沿用辽法，到皇统时，以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制定了金统一的法制《皇统制》。

在艺术文化交流中，金注意吸取唐、宋文艺精华。金初，较成熟的作家如宇文虚中、吴激、蔡松年等，都是由宋入金，他们向女真人传播了汉族文学艺术，他们本身的创作也成为金代文学的一部分。洪皓使金，被留15年，“为金人所敬，所著诗文，争钞诵，求钁梓。”^⑧

金宫廷中流传汉族的古典诗词。金的诗词创作主要宗苏黄，是继“北宋诸贤”发展起来的。“苏学盛于北”，说明北人喜欢苏轼那种自由洒脱、豪放不羁如行云流水的气质。通俗的柳词也在金广为流传。1141年，为庆祝兀术打败宋军，金大臣纷纷写诗进呈。熙宗说：“太平之世，当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⑨汉化的金代帝王，也多能写诗作词、知书善画。章宗明昌二年，学士院进“唐杜甫、韩愈、刘禹锡、杜牧、贾岛、王建、宋王偁、欧阳

修、王安石、苏轼、张耒、秦观等集二十六部。”^②在汉文学滋养下，金出现不少作家。

“那一片茂盛的鲜花是整个时代的产物”，而继承建安以来优良传统，可作为少陵嗣响的元好问，可说是“一根最美的枝条”^③。金诗词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借鉴了汉族诗词，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北方民族特色，如北方辽阔壮丽的景色，纯真而坦率的感情，英勇而豪迈的气概；艺术格调粗犷健朗，充满阳刚之美和勇武之气。“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④还应提及，在金统治下的北方长大的词人辛弃疾归到南方后，他以“大声鞑靼，小声铿锵”的豪放悲壮的词作，震动了整个词坛；他带去了北方苍凉劲健的词风，对南北文学的交融做出了贡献。

金代文派以韩愈、欧阳修、苏轼为正宗，质胜于文，不重形式，文字近俗，促进了北方通俗文学的保留与发展。清文学家阮元说：“金之奄有中原，条教诏令，肃然丕振，故当大定以后，其文章雄健直继北宋诸贤。”^⑤被元好问誉为金代文坛正宗之传的蔡攸被称为“建领一派雄燕都”^⑥。这都表明金文是唐宋文的继续发展。金把汉族四六排偶的骈体文作为皇帝诏敕和官府奏文的主要形式。另外，王若虚的文学批评值得称道，也初步建立了文法和修辞学。

金代城市中流行说书及演唱诸宫调、杂剧，并有人以此为业。这些艺术形式来自南宋，《东京梦华录》等记载了宋代这些艺术之盛行。金院本与宋杂剧在表演形式上、内容上、角色上既有相似处，又有独创特点的文艺形式。据元陶宗仪《辍耕录》卷25载院本名目，共690种，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认为系金人所作。名目中有少数与南宋“官本杂剧段数”中名目相同，可看出其继承关系。金代侯马董墓中左起第五人脸上勾画的三角形的白鼻子，这种“豆腐块”的化装，可能源于金代戏剧。董墓“金戏俑”的表演形式表明，金代戏剧已摆脱宋杂剧早期的程序而发展为不是专以诙谐为主，而以表现人物、故事为主的鼻梁抹粉、面颊涂黑的副净，其他人物已侧居其次。这种戏曲艺术程式的形成与发展，为元杂剧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此外，金已在民间建筑木构砖砌的固定舞台，改变了北宋早期的勾栏式的粗糙的舞台形式，中国戏曲舞台艺术在金已形成。^⑦在山西万荣、沁县、洪洞、平阳等，当时都有固定的“舞亭”、“舞楼”、“露台”等建设。^⑧这些戏台都设在寺庙里，人民群众利用迎神赛会机会，欣赏各种戏曲演出。没有这样的群众基础，元杂剧的繁荣是不可能的。

诸宫调创于北宋，但到宋金时才大大流行。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1说：“比前贤乐府不中听，在诸宫调里却著数。”表明诸宫调在金颇流行。董西厢在思想上、艺术上都远远超过前人关于崔张恋爱故事的作品，戏曲方面第一次出现长篇组曲，所以被誉为“古今传奇之祖”，对后来影响很大。

一方面是汉文化北移，另一方面是女真文化南移。女真人带去了马上弹奏的歌曲，与河北、辽东等地的“慷慨悲歌”曲调相结合，形成了新的诗歌体——散曲。王世贞在《曲藻序》中说：“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接，乃更为新声以媚之……大江南北，渐染胡语。”现存《者刺古》、《阿纳忽》、《唐古歹》等曲牌，显然是北方乐曲。比起传统诗词，“更为新声”的散曲摆脱了束缚，声韵自然，词不能四声通押，而北曲四声通押现象普遍；文字通俗浅近，衬字、增句较自由（南曲中衬字就较少），诸宫调、散曲都如此；取材也较大胆，禁区较少。总之，散曲有更大的灵活性。金代文人中已有人大胆尝试散曲创作了。^⑨吴梅《南北戏曲概言》云：“金元以来，士大夫好以俚语入词，酒边灯下，四字沁园春，七字瑞鹧鸪，粗豪横决，动以稼轩，龙洲（刘过）自况，同时诸调

词变为曲之始。”王世贞《曲藻》：“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徐谓《南词叙录》：“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音，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日用。宋词既不可被管弦，南人亦遂尚此，上下风靡。”两人都谈到“北曲”的产生、风格、普及乃至对汉族文学的影响。金代戏曲及通俗文学比起汉族文学，确有其特色：1.忠、孝观念不明显，男女地位较为平等。2.叙事性较强。3.风格上具慷慨悲壮气质，往往带豪迈之气、阳刚之性等。“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信胡人之善于鼓怒也。”^③4.金元及其后传统文学渐衰，通俗文学兴起，妇女及中下层人在作品中地位有明显变化，作品文字走向白话等，都与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给中华古老文化增添了新鲜血液有关。落后民族对先进民族的征服带来的文化交流中，原来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由于腐蚀性暴露，必然形成有利于通俗文化发展的状况。

金代音乐，也受中原影响，金得宋，方有金石之乐：“初，太宗取汴，得宋之仪章钟磬乐箎，挈之以归。皇统元年，熙宗加尊号，始就用宋乐。”^④在金上京城内还出土一件刻有“上京都僧录官”字款的“大晟编钟”，是宋徽宗仿商周古乐器铸造的“大晟乐”里的乐器，为金所获。伊春金山屯出土的八面浮雕石幢，每面分别刻有舞乐形象，上面乐器有箫、琵琶、笙、鼓等，都是唐、宋时中原常用的乐器。金“燕饮音乐，皆习汉风”^⑤，当时宫廷歌女、乐工能熟练演奏北宋柳永的《望海潮》之类的曲子^⑥。金的艺人不少也是从宋得来。吴激《春从天上来》词写的老姬，是流落金源内地的宋梨园旧籍者。金曾接连向宋廷“索诸色人”，其中有教场乐人若干，舞台祇候妓女千人，杂剧、说话弄影戏、小说唱嘌、弄傀儡、打筋弹等琵琶、吹笙等艺人一百五十余家。^⑦这些人无疑是文化传播的媒介。

金的画工中也可能有汉人。天会三年（1125年），许亢宗使金时也带去“后苑作匠”。开封陷落，宋许多书画被掳走。金画院的都监王庭筠是汉人。金章宗学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体书法。学书者以宋之苏、黄、米诸家为法。金人字画佳者，往往被比为米体。显宗允恭所画人马风格类似李公麟，金张瑄《文姬归汉图》十分精妙，风格也和宋画相通，贵族中收藏汉人书画也蔚然成风。黑龙江出土的大量金代文物，上面带有的汉字，风格与宋同类文物上的完全相同。山西繁峙岩上寺著名的金代壁画，内容是佛教故事，也有一些是表现宫廷楼阁，《宫辇图》、《楼阁图》、《卷帘图》等，从内容到风格都可看出和汉人壁画的相通。中原一些石窟中以飞天为题材的雕刻艺术与壁画，也影响到东北的雕刻艺术。黑龙江省绥滨中兴金墓群出土的玉鱼、玉人、玉飞天，都很精美。从飞天的形态、服饰来看，显然受唐佛教壁画飞天和中原石窟雕刻艺术影响。金铜镜绝大多数是仿照汉、唐、宋镜的形制风格制造的，惯常采用双鱼、双龙、双凤和人物传奇故事题材为镜背图案。金代浮雕和故事镜图案内容，大多取材唐宋传奇故事。锦西墓中出土了许多孝子故事的浮雕作品，阿城白城遗址出土了“许由巢父故事镜”。神话故事镜还有牛郎织女镜、月空嫦娥镜等。金版画已开始由对佛教的雕绘变为对人物的雕绘，这是中国版画雕刻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开后来元刻平话附图及明传奇附图之先声。

龙文化对女真文化也有影响。通河县乌鸦泡出土的铜镜上龙形象基本构图与中原的相似。此外，还发现龙头圆雕、龙纹瓦当等。

由上可见，中原汉族文化北移及与女真文化的相互影响，造成了金代女真文化的发展繁荣。其文化艺术表现在北方更为开放自由，如散曲较词自由，北曲较南曲洒脱，叙事的演唱文学较南宋的脱离刻板，各种艺术形式更加浅近俚俗，平易近人，艺术风格呈现出“铁马秋

风塞北”的特色。简言之，处于动乱时代的女真文化，其流量是十分巨大的，它使女真迅速强大起来。进入阶级社会的女真于是加紧了对外扩张和掠夺，终于灭辽、北宋，建立了金朝，女真文化因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发生了重要影响，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① 余敦华著、袁树仁译：《中国面向世界》开篇。

② 《大金国志·初兴风土》。

③ 《金史》卷44《兵志》。

④ 汤因比：《历史研究》第201页。

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页；第3卷第424—425页。

⑦ 《金史·外戚传》。

⑧ 洪皓：《松漠纪闻》。

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5，真宗咸平六年七月。

⑩ 《大金吊伐录·与宋王书》。

⑪ 以上采用哈尔滨师范大学董克昌先生据《金史·礼志》的统计。

⑫⑬ 《三朝北盟会编》卷4。

⑭ 马扩：《茅斋自叙》。

⑮ 元好问：《续夷坚志》。

⑯ 《金史》卷49《食货志》。

⑰⑱ 《三朝北盟会编》（以下简称《会编》）炎兴下轶，靖康中轶。

⑲ 《会编》卷149，绍兴元年十二月；《宋会要辑录》册140，页5487；《食货志》乾道五年十月，页5738。

⑳ 《会编》卷186，绍兴三十年九月壬午。

㉑ [苏]B·E·杰列维扬科：《黑龙江沿岸的古代部落》。

㉒ 《金史》卷3《太宗纪》。

㉓ 《金史》卷8。

㉔ 张博泉：《金代的教育》，《史学集刊》1989年1期。

㉕ 《大金国志》卷21。

㉖ 《金史》卷125《文艺传》；卷35《礼志》。

㉗ 《宋史》卷75《洪皓传》。

㉘②③ 《金史》卷4；卷9。

㉙ 丹纳：《艺术哲学》第217页。

㉚ 元好问：《论诗绝句》。

㉛ 阮元：《金文最序》。

㉜ 郝经：《书蔡正甫集后》。

㉝ 《戏剧研究》1959年2期刘念兹之文。

㉞ 《文物》1989年10期谈金代出土文物的文章，也证实了这一点。

㉟ 《归潜志》卷10，举海陵王之世，赵可在科举考场所作歌谣，类似散曲。

㊱ 徐渭：《南词叙录》。

㊲②③ 《金史》卷39《乐志》；卷7《世宗纪》。

㊳ 《大金国志》卷15。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文物考古所、黑龙江省物价局、哈尔滨市文物管理站 责任编辑：那晓波

1413 年永宁寺碑与金代女真文石刻

和希格

内容提要: 本文对建于明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的奴儿干都司永宁寺碑与金代女真文石刻以及满语资料进行了比较,认为它们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作者认为,永宁寺碑上承金代女真语文,下启满语文,对于研究女真语言文字的发展演变过程和满语形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 永宁寺碑 金代 女真文石刻 满语

奴儿干都司永宁寺碑(以下用简称)建于明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此碑原立于今俄罗斯境内黑龙江近海口南岸的特林地方,现藏于海参崴远东学院博物馆。碑阳为汉字,碑阴刻有对译的蒙古字和女真字。碑两侧刻有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吽”汉、蒙、藏、女真四种文字。内容记载永乐帝派遣内官亦失哈至奴儿干地区建都司衙门,授官爵印信,赐衣服布钞,造寺塑佛,民皆欢乐的事迹。此碑是明代唯一女真字碑,对于金明两代女真语文的研究和女真字演变规律的探讨,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清光绪十七年(1892)长顺等编的《吉林通志》是最早记载此碑的一书。

从公元 1119 年女真文创制到 1413 年永宁寺碑女真文刻石的问世,相距近三百年;金朝灭亡的 1234 年至永宁寺碑的建立,中间经历元朝又是 180 年;永宁寺碑至女真文流传的下限 1445 年(明英宗正统十年)仅仅才 30 余年,到满文创制的 1599 年(明万历二十七年)为止还不到 190 年。而以该碑的刻石年代为划线,往前推至金朝灭亡和往后进到满文的创制又是差不多相隔相等历史时期。

从女真文创制至满文出现的长达近五个世纪中,女真文曾经历三朝重大的历史变动和语言演变。了解女真文发展到满文的过程,永宁寺碑起着上承金代女真文下启满文的实物作用。它既保留着金代女真文石刻的语言特点,又显露着近似于满语的初生萌芽。所以,永宁寺碑女真文石刻与金代女真碑文的比较研究,对于语言发展规律尤其是对于女真文演变过程和满语形成条件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试就这方面做一初步探究,希望有关专家和同行予以指正。

永宁寺碑与金代石刻女真文在基本的文字结构和语言特点方面一致地方很多。现分析如下:

女真字	女真字读音	汉义	出处
𐰑	abha	天	《永宁寺》碑 1 《得胜陀》碑 23
𐰓	na	地	《永宁寺》碑 1

件	nialma	人	《得胜陀》碑 26 《永宁寺》碑 8 《庆源》碑 4:5
兒	sun	太阳	《永宁寺》碑 7 《得胜陀》碑 27
日	inenggi	日	《永宁寺》碑 13 《进士》碑 2
方	tumen	万	《永宁寺》碑 12 《得胜陀》碑 26

上述以一个女真字表示一个词的基本词汇,在金明两代一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从文字结构到读音规律十分稳定。这证明,基本词汇世代被人们使用过程中形成极大的稳固性,从而成为具有长久生命的词汇。

还有些多音节石刻文,其词意表现于词干或第一音节,由词干加词缀构成。其中大部分也是基本词汇之一。这批字是女真字演变过程中形成的。如:

女真字	女真字读音	汉义	出处
策史	jule-e	前	《永宁寺》碑 11 《进士》碑 2
差天	sak-dai	老	《永宁寺》碑 9 《得胜陀》碑 27
升土	ancun-un	金	《永宁寺》碑 10 《庆源》碑 1:3
𐰚𐰣	doro-o	印(礼)	《永宁寺》碑 8 《得胜陀》碑 17
圣号	dandi-lu	生	《永宁寺》碑 8 《得胜陀》碑 26
𐰚𐰣	omo-lo	孙	《永宁寺》碑 12 《得胜陀》碑 27

女真字最初是一个字表示一个词汇,继而产生词缀。上述例子正是由一个女真字演变成为词干加词缀的形式。即女真字发展的第二阶段。此后产生音节文字。正如金启孺先生在《陕西碑林发现的女真文书》①一文所举的,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鞍: 𐰚 engemer → 𐰚𐰣 enge-mer → 𐰚𐰣伏 en-ge-mer

发: 𐰚 funilhei → 𐰚𐰣 funil-hei → 𐰚𐰣升 fun-il-hei

永宁寺碑中间干加词缀所组成的第二发展阶段词至少说明:一、明代仍保留着金代石刻文中词干附有词缀形的向音节文字转化的痕迹;二、女真字终究没有发展成为音节文字体系。

永宁寺碑和金代石刻文中格助词十分活跃,其中尤以领格、方位格助词为多见。现仅举领格助词如下:

并𐰚𐰣𐰚𐰣 都司衙门《永宁寺》碑 6

du si i ha fan
都司的衙门